



斯洛文尼亞和周邊各國 周維強繪

# 來自斯洛文尼亞的天文學家劉松齡

萬娜塔莎 (Natasa VAMPPELJ SUHADOLNIK) 著

周維強譯

十七八世紀，歐洲耶穌會士爲了傳教事業來到中國，他們用天文科技說服了清朝的統治者，成功地掌握了欽天監，得到了觀測天象和編製曆法的權力，耶穌會士湯若望、南懷仁和戴進賢等，甚至成爲欽天監的監正，締造出中欧科技交流的歷史篇章。不過，在這些外籍欽天監監正中，有一位比較不爲人注意，他是來自斯洛文尼亞的劉松齡。

## 長眠北京的斯洛文尼亞人

北京車公莊耶穌會士墓地中，豎立著一個螭首碑額的巨大墓碑，墓碑中央刻有「耶穌會士劉公之墓」八個大字。墓碑兩側各有中文和拉丁文碑文，記載了墓主的簡要生平、職官略歷和傑出貢獻：

耶穌會士劉先生諱松齡，號喬年，

泰西熱爾瑪尼亞國人。自幼入會精修，大清乾隆四年來京傳教。乾隆八年奉旨補授欽天監監副，乾隆十一年特授監正；乾隆十八年因接送波爾都噶但亞國使臣有功，賞給三品職銜食俸，共在監三十一載。勤敏監務，敬寅怒屬，德業兼著。卒於乾隆三十九年，享壽七十有

二。蒙恩旨賜內庫銀二百兩爲安葬之資。  
碑文指出墓主劉松齡是來自歐洲的熱爾瑪尼亞人。清高宗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被任命爲欽天監監正，直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卒於任上，任職長達二十八年。  
在中文文獻中，劉松齡是熱

爾瑪尼亞（日耳曼）人，但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八〇和九〇年代，他才被正名爲斯洛文尼亞天文學家和耶穌會士，他的原名是斐迪南·奧古斯丁·哈勒斯坦（Ferdinand Avguštin Hallerstein）。對照西方史料可知，

他是來自卡爾尼奧拉（Carinthia）拉巴森（Ljubljana）的貴族。在碑文中被稱爲熱爾瑪尼亞人，是因爲當時拉巴森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而拉巴森就是現在斯洛文尼亞首府的盧布雅納（Ljubljana）。劉松齡之所以被視爲日耳曼人或奧地利人，肇因於他的家鄉當時是奧地利的一部分。（註一）

## 重新發現劉松齡

劉松齡在十八世紀的北京享有盛名，對當時中國的科學和天文發展貢獻卓著，在中歐文明交流也扮演著顯著的角色。當時，他作爲倫敦英國皇家學會、巴黎法國皇家學會和聖彼得堡俄國皇家學會的通訊會員，他的書信中記載著關於天文、科學、社會和政治等範疇的內容，常被當時歐洲的專業期刊所刊載。然而，二百年多來，他的歷史地位卻被隱沒了。

重新發現劉松齡的工作，是在八〇年代，由斯洛文尼亞和中國進行檔案合作所啓動，學者們藉由比對保存於雙方的檔案得知，斯洛文尼亞籍的哈勒斯坦就是耶穌會士劉松齡，他是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在中國

欽天監享有獨特地位長達三十一年。一九八五年，鞠德源教授在《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發表了〈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一文。（註二）稍後，由斯洛文尼亞接力推動，在盧布雅納（Ljubljana）舉辦了「紀念劉松齡三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明格斯博物館（Menges' museum）在他出生的故居，設置了一個青銅紀念牌。接著獲得了爲期兩年的歐盟計畫，用於研究劉松齡的文化角色，包括在數個歐洲國家及中國進行以劉松齡爲主題的藝術推廣活動，並整合了歷史檔案、當代表演藝術和新媒體藝術的表演活動，同時更進一步增強對劉松齡科學貢獻的研究。在幾個國際學術會議中，以二〇〇九年在北京所舉辦的「早期歐洲來華傳教士與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最爲重要，因爲它首次提供了討論劉松齡在華活動的平台，使得來自不同研究機構和不同研究領域的中國學者得以共聚一堂，相互激盪。（Sage, 2009, pp. 46-47.）  
近十五年來，由於發現了許多被遺忘的文件、科學報告和信件，因此研究劉松齡的成果逐漸浮現。這些



圖五 劉松齡故居設置的青銅紀念牌 Ralf Čeplak Mencin攝



圖四 劉松齡在明格斯的故居 Ralf Čeplak Mencin攝



圖六 劉松齡在明格斯的故居 Courtesy of Museum Mengeš, Slovenia

夫斯曼堡 (Hoffmanburg)。劉松齡生於一七〇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一天後受洗。自當地的耶穌會學校畢業後，決定把一生獻給耶穌會。於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維也納進入耶穌會。在首途維也納前，他已學習了三年哲學，之後他在維也納和格拉茲 (Graz) 學習數學、天文學和神學。

一七二七年，他決定參與傳教工作，而且特別殷切期待前往中國，但他必須等待八年後，以取得耶穌會領導明確的回覆，並再等待一年以取得前往中國的准許。決定獻身中國的傳教工作後，他前往里斯本 (Lisbon)，(註五) 在一七三五年秋季通過第里亞斯特

文獻都是劉松齡從北京寄往歐洲後，散落在各個歐洲國家的檔案中(包括奧地利、義大利、梵諦岡教廷、葡萄牙、俄羅斯、法國、英國、比利時和斯洛文尼亞等國)。他在華的四十年間，與歐洲的耶穌會士、兄弟耶穌會士魏查德 (Weichard)、姊妹安娜 (Ana)，甚至是葡萄牙的王太后瑪麗亞·安娜 (Maria Ana) 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同時，他也是英、法、俄三國皇家科學會的通訊會員，他將科學領域的著作發表在當時的各種科學期刊中。(註三) 在一七五五和

一七五八年，他的部分書信也會以德文刊登於耶穌會的期刊《新世界》(Der Neue Welt-Bot) 中。部分作品也會在一七八一年由匈牙利耶穌會士和史學家佩利 (György Pray) 翻譯成拉丁文，收錄於 *Imposturae CCXVIII in dissertatione R. P. Benedicti Cerro, Clerici Regularis a Scholis Pius de Sinensium Imposturisdetectae et convulsae* 中。(Maver 2009, pp. 209-235.) 迄今所發現大多數劉松齡的信件都已被英譯出版(一些純粹科學者除外)，收錄在第一本關於劉松齡的英文專著中，



圖一 北京車公莊利瑪竇墓及明清以來外國傳教士墓地 周維強攝



圖三 劉松齡墓碑拓片 引自《雞逝猶存·柵欄：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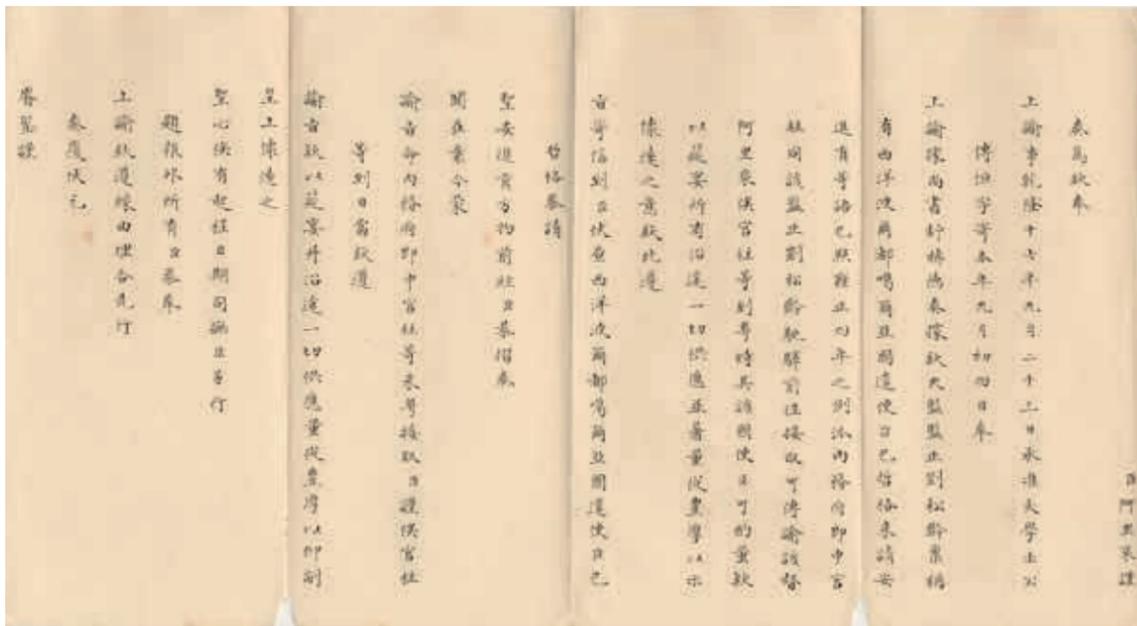
由薩米加 (Mirja Sale) 主編的《劉松齡：在華耶穌會士智慧和虔誠的多元文化傳統》，此書已於二〇〇九年在斯洛文尼亞出版。(註四)

由於上述學術和出版的推動，使得世人首次得以獲知他書信的內容，深入了解這位乾隆朝傑出的傳教士的歷史活動。他的書信中不但討論了宗教事務和在華耶穌會士的地位，也提供了氣候、動物名詞和當地風俗習慣，以及他在清廷的地位、他與乾隆皇帝的關係、批評或贊同乾隆皇帝的政治社會命令等內容。鑑於乾隆朝對於文字書寫的嚴格控制，他的書信對於認識十八世紀的中國提供了有價值且罕見的訊息，可見其珍貴價值。

### 劉松齡的作品和成就

奧古斯丁·哈勒斯坦是貴族雅耐茲·斐迪南·哈勒斯坦 (Janz Ferdinand Hallerstein, 1669-1736) 和瑪麗·蘇珊納·伊利薩貝塔·艾爾伯格 (Marija Suzana Elizabetha Eberg, 1681-1725) 之子，他們居住在盧布雅納近郊的小鎮(明格斯)的家族城堡(稱為拉芙巴城堡 Ravbar castle 或霍

(Trieste) 和熱那亞 (Genoa)，前往葡萄牙。至一七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里斯本搭上前往遠東的船。在超過兩年的航行中，曾在莫桑比克 (Mozambique) 和果阿 (Goa) 兩地稍做滯留，(註六) 終於在一七三八年九月抵達廣東。他先在澳門致力學習中文，期間澳門總督要求他繪製澳門和周圍地帶的地圖。次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他前往北京加入其耶穌會士在欽天監的工作，當時是在日耳曼籍耶穌會士戴進賢 (Ignatius Kögler, 1680-1746) 的領導之下。一七四六年戴進賢去世後，他接替了戴進賢的職位長達約三十年(自一七四六至一七七四年年間，或自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九年)，是西方人中任此職最久者。他抵達北京後不久，奉命協助戴進賢修訂康熙朝所修纂的《靈臺儀象志》，此書是戴進賢的前任耶穌會士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於一六七四年所修纂。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此書修訂完成後，乾隆賜名《儀象考成》，並撰寫〈御製序〉以誌此功。鞠德源已經指



圖九 阿里袁奏〈為遵旨安排接取西洋波爾都噶爾國使臣入京進貢禮奏〉 乾隆17年10月1日 8扣 局部 故宮0283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十一日寄給兄弟魏查德的書信得知，由於葡萄牙王太后的推薦，他被指派擔任護送葡萄牙國王的特使，他同時也是乾隆皇帝期望的人選：閣下已經知道，葡萄牙王廷已經派遣了一支特使團前來晉見中國皇帝。由於氣候適宜，特使團抵達澳門的時間在去年，即一七五二年八月。十月二日，我收到特使團向我解釋此行的目的信件，請求我親自前往澳門去迎接代表團，並引導前往北京。此信中還附有一封來自最尊貴的葡萄牙王太后的書信，她屈尊的推薦我擔任此職。從我們一些其他同事的信件中得知，我已經了解，這是出自最尊貴和虔誠的國王自身的期待。(Sate ed., 2009, 340.)

劉松齡往來北京與廣州達四次之多，外交任務亦非常成功，乾隆皇帝因此賞賜劉松齡三品頂戴。

在完成這些任務和成就的同時，他在北京的傳教工作和宮廷內的工作亦同時進行著。劉松齡在宮廷中的例行工作是觀測天象、計算曆法、預報日月蝕和預報自然災害等。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檔案中，我們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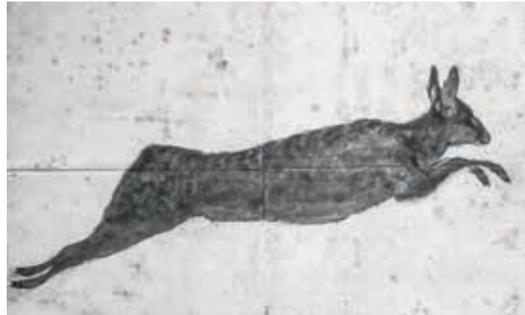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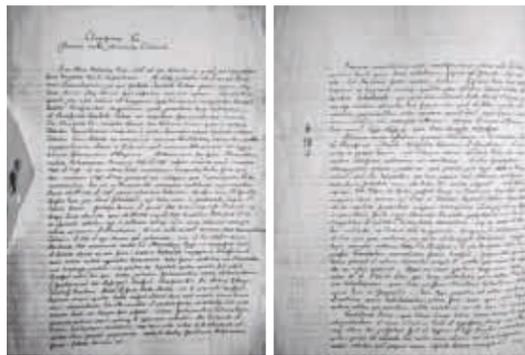
### 劉松齡的信件和他對郎世寧藝術的欣賞

劉松齡在華期間，與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各學會，同時也和其他歐洲的耶穌會士，還有自己的家族成員密切聯繫，特別是他的兄弟魏查德。魏查德是耶穌會士，亦是荷蘭總督——洛林的卡爾親王 (Prince Karl

以發現兩份軍機處檔奏摺錄副與劉松齡的天文工作有關。從奏摺錄副的內容可知，這是在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即在他去世前五年，向皇帝奏報的內容。奏摺錄副的主旨是劉松齡向皇帝奏報觀象臺發現一顆新星，這顆星可能是彗星。（註八）本件的硃批日期為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劉松齡接著提到「按《占書》曰：彗星出，為兵柄所在」，並呈報「臣等逐日敬謹觀候，消退不見，再行具奏，為此奏聞」。這些由劉松齡所上奏的奏摺，係直達乾隆皇帝御前。由奏報內容可以得知，劉松齡的工作細緻而準確，他直接向皇帝負責，可直接向皇帝奏陳，足見他在乾隆皇帝前極受榮寵。



圖七 璣衡撫辰儀 Nataša Vampelj Suhadolnik攝



圖八 劉松齡於1750年9月18日從北京寄往倫敦皇家學會的信件原件，內容包括了天文觀測和一種香獐子（亞洲麝的一種，學名moschus moschiferus）。引自P. Škrlep, Museum Mengeš, Slovenia

除了他在天文學上的傲人成就外，他的傑出貢獻尚涉及其他科學領域。他因為對於感應電的實驗而為人所知 (Južni, 2009, pp. 119-157)，而他在製圖、地理和人口結構的工作，不但對於中國朝廷十分重要，對於歐洲知識界也一樣重要；例如，他以不同時間下北京和聖彼得堡觀測木星衛星軌道時間差，計算了北京的地理長度。(Šmitrek 2009, pp. 95) 他也是第一位精確計算中國人口數量的人，據他的統計，一七六〇年十九省的居民有196,837,977人，而一七六一年則為198,214,533人。(Šmitrek 2009, pp. 95-96) 除了澳門地圖外，他還奉命與傅作霖 (Felix da Rocha, 1713-1781) 合作，繪製了乾隆皇帝的御苑——滿洲的木蘭圍場地圖。

他的外交成就也十分重要。當時中國缺乏與歐洲世界的外交關係，劉松齡嫻熟六種語言，在中國事務上扮演了外交或是調停人的重要角色。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葡萄牙特使團於一七五三年來到北京時，由他擔任中介者。從他一七五三年十月

出了《儀象考成》中劉松齡所寫部分的重要性，此書於一七四六年戴進賢去世後，由劉松齡接手完成。（鞠德源二〇〇九·一七〇頁）《儀象考成》加入了一千七百六十四顆星（《靈臺儀象志》僅有一千三百一十九顆星），代表著十八世紀天文和科學上的重要成就，不僅在中國，還有歐洲；一七五七年，此書於中國出版後，很快的就在西方出現由 Tsuchihashi 和 Chavaler 翻譯的法譯本。

劉松齡進一步的領導製作地球和天體儀，並幫助設計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文儀器「璣衡撫辰儀」，以用於非常精密的天文觀測。璣衡撫



圖十二 劉松齡用來記錄觀測彗星的天文儀器  
地平經緯儀 周維強攝

完全轉變了，反而對中國人頗有好感，且對中國皇帝和中國人的讚揚無法言喻。特別是當他寫到一七五三年至一七五八年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的戰事，皇帝因而擴大了帝國的版圖；從他所寫關於乾隆皇帝軍功的部分，可以看出他對此事的驕傲。(Sajé ed., 2009, pp. 348-358) 在他生命的最後，他甚至將中國和歐洲國家放在相反的位置，聲稱中國人喜歡和平，而歐洲人傾向於戰爭：

中華帝國是一個和平和有序的帝國，這就是帝國能永延國祚的原因。歐洲人喜好戰爭的程度，就如同中國人喜好和平的程度。難道這或許因為歐洲的王國是從戰爭中建立的，但中華帝國卻是建立在和平

和自發成長的嗎？或者說，如果我們說出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帝國只有一個皇帝，但歐洲的帝國卻擁有多個君主？很明確地在中國皇帝力量最衰弱的時代，眾多諸侯彼此交戰，其中一位問哲學家孟子，何時才能再次謀求和平，孟子回應道：直到天下統一的時候。(Sajé ed., 2009, pp. 360-361.) (註九)

他以欽佩乾隆皇帝的偉大作為總結，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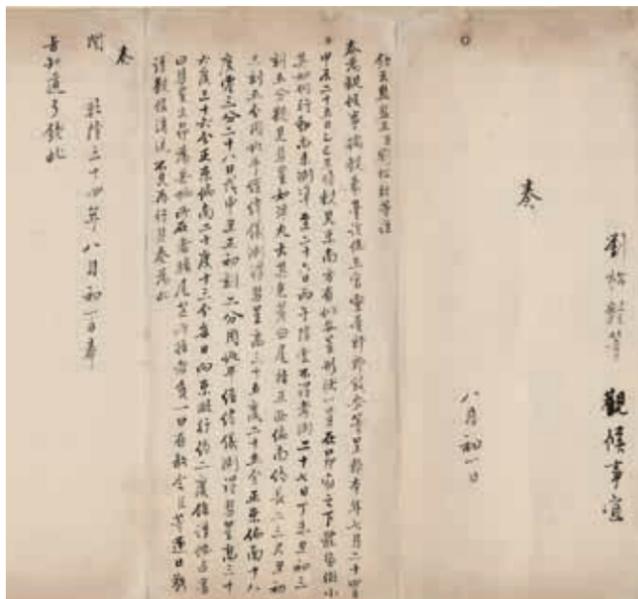
如果開始想，甚至是描述皇上在國內外、出獵或出巡時處理政務的一致性、儆醒，以及審慎，那我就寫不完了。治理和隨時準備服從是他成就大業，並且圓滿退位最重要的關鍵。中國人被治理到懂得得領導統御。如果我不中斷這個故事，故事就永遠講不完了。(Sajé ed., 2009, p. 362.)

在信中，劉松齡也提供了一些關於宮廷繪畫的描述，特別是乾隆皇帝最喜愛的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他在宮廷中的地位。在劉松齡的信中，總是給予郎世寧畫作高度的讚譽，這兩個異鄉

人的故鄉相距不遠：年輕的劉松齡，較郎世寧抵達中國晚二十三年，郎世寧是較為資深的傳教士，或許是藉由年輕的劉松齡敬仰尊長的態度，兩人因而發展出深厚友誼。劉松齡抵達北京後，最初住在學院的住所，但在一七四三年底前，如同他在「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信中所提及，他搬往靠近聖約瑟夫教堂附近，與陳善策 (Domingos Pinheyro)、魏繼晉 (Florian Bahr)、利博明 (Ferdinando Moggi) 和郎世寧等人同住。(Sajé ed., 2009, pp. 303-304.)

劉松齡在抵達北京後不久，於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曾寫一封長信給兄弟，仔細描述了他的旅程，也包括了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和北京耶穌會社群的進一步描述。當描述耶穌會士數量和他們的工作時，他以下列的文字描述郎世寧：

郎世寧修士是一位偉大的畫家，在他的畫中描繪我們的小教堂，此畫是如此的熟練而富於技巧，一位曾受繪畫教育剛從羅馬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驚呼說，即便是在羅馬，這個小教堂也會成為注目的焦點。(Sajé



圖十 劉松齡等奏〈為東南方有似彗星形狀一星在昴宿之下候消退不見再行具奏奏聞事〉 乾隆34年7月29日或30日 4扣 局部 故機0103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劉松齡等奏〈為臣等於7月24日、25日丑時觀見東南方有似彗星形狀一星在昴宿之下體勢微小奏聞事〉 乾隆34年8月18日 4扣 局部 故機0104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of Lorraine) 的懺悔者。因為給他兄弟的信件數量眾多，且提供了長期且詳細關於中國人習慣、信仰、宗教和衣著的描述，而特別有趣，因此劉松齡也成為第一位且最傑出的斯洛文尼亞「原」漢學家。

在一封較早期的信件中，寫於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他記錄了從里斯本、莫桑比亞、臥亞、滿刺加，以及從澳門到北京的漫長旅程。接著又描繪他首次見到皇帝，以及完整記述耶穌會士在北京的住所和北京居

民的一切，因此，這封信不只提供了十八世紀搭乘船隻旅行時有價值的訊息，也描繪了他抵達北京時，在華歐洲耶穌會士的樣貌。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對於中國人的態度十分有趣。較早的信，顯示他對於中國人針對一切事物的懷疑論和陰謀論地強烈批評。在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他寄給李特神父 (Father Joseph Ritter) 的信件中，敘述了對傳教工作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衙門的輕蔑態度：

這一不確定性，不完全歸因於皇帝對我們以及我們神聖信仰的不喜好。確定的是，皇帝雖然並不喜歡我們，但也不討厭我們。罪惡在於這裡的衙門，特別是禮部衙門，它處理這個國家內的所有信仰事務，但對於我們的信仰是十分輕蔑的。總之，當他們一旦接近皇帝抱怨時，皇帝便會抗拒這些道德上的法官，回應說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信仰，其預言和星占術在中國從未禁止。無論如何，沒有人可以在這些不確定的風聲上建立任何東西，同樣地，也沒有辦法在一些衙門的裁判們維持友好和禮貌上建立任何東西。漢人和滿人是狡猾多端的，除非當你了解到暴露在被欺騙的危險時，才能相信。(Sajé ed., 2009, p. 307.)

在一七四九年給魏查德和吉昂皮莫 (Nicolas Giampiano) 的信中，他持續地加重怨恨中國人，認為中國人相當的嬌寵和衰弱；這些觀點多少來自清政府對華南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的數起壓迫。

然而，在他生命終結前，態度

ed., 2009, p. 283.)

他經常將郎世寧的作品與當代羅馬或是歐洲的藝術作品相比較，並以羅馬流行的風尚為準，將郎世寧的作品視為等同或高於歐洲的水平。在劉松齡的觀念中，當歐洲的畫作在皇帝眼中備受青睞時，中國朝廷對於歐洲科學的興趣卻正在消退；因此，他看見繪畫藝術和郎世寧作品的理想機會，因為這可以改善耶穌會活動的處境，並進一步對天主教傳播有所貢獻。

宮廷對於郎世寧藝術的肯定，能使畫家成為當時第一且唯一進入皇帝和后妃們私人空間的歐洲人。這給予了他們傳教活動更大的機會。摘自他一七四一年十月十日寫給他兄弟的信中，與郎世寧作品和他在宮廷中備受推崇地位有關的內容，相當值得被全文列出：

中國的高階官員們以皇帝為榜樣，他們只認可歐洲的繪畫藝術，這導致郎世寧修士總是受到皇帝的歡迎，並屈尊的使用這位歐洲大師的畫筆。數年前，郎世寧已經在雍正皇帝的命令下描繪百駿圖，每一個部分，郎世寧運用顏色並描繪儀

態，繪於六呎 (fathom) 長、二呎

寬的帆布上。現任的皇帝特別喜歡這幅巨作，希望能以相同的意象繪製較小的版本，以便他可以隨時拿在手中，並將之畫在他的傘蓋上，郎世寧滿足了皇帝的需求，在很短的時間內完美而一絲不苟的完成了工作；所有的歐洲同行，對於前者和繪製於如此小空間的第二個作品，表示了一致的好評。此一努力並未使皇帝感到滿足，他要求郎世寧以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姿勢和衣著，繪製皇帝的畫像。甚至，這是在中國前所未聞的，他召見這位傳教士藝術家到他的宮殿，並進入他妻子的私人房間，這是從未被歐洲人所看見的。皇帝帶領他到此後，下令他依照原先的畫法替皇后畫像，郎世寧因此得以捕捉帝后兩人的形象，而帝后二人也完全滿意。(Sajce ed., 2009, pp. 299-300.)

除了郎世寧的著名畫作〈百駿圖〉的資訊外，劉松齡也提供了郎世寧作品的其他訊息，如一系列由四位歐洲傳教士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王致誠

(Denis Artret, 1702-1768)、艾啓

蒙 (Ignaz Sichelbarth, 1708-1780)、安德義 (Augustinian Jean Damascene Sallustio, ?-1781) 所繪的得勝圖，以及皇帝希望能夠以銅板製作，並每幅刷印一百張。(Sajce ed., 2009, pp. 351-354.)

在他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信件中，他報告了著名畫師郎世寧的死訊。(Sajce ed., 2009, pp. 359-362.) 在羅馬詔令的主要檔案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尚未出版的手稿，是耶穌會士藝術家的傳記 (posthumous memoir)，在傳記中描繪了郎世寧的專業能力，和他光耀了十八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文化關係。這篇傳記的作者極有可能是劉松齡，不過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來確認。

### 結論

基於劉松齡和郎世寧的友誼，郎世寧十分可能為其做肖像畫，但可惜的是，迄今仍無任何劉松齡的畫像被發現。關於他形貌的唯一簡短文字描繪，保存在一份朝鮮教會對於中國的報告內容裡。報告中描繪劉松齡是

一位六十二歲看起來健康的老人，擁有深邃而銳利的眼睛，蓄有灰色的鬍鬚，前額頭髮剃去，綁有長辮，並穿著正式的中國官服。(Sajce, 2009, p. 45.)

就其成就言，這位蓄鬚的斯洛文

尼亞明格斯 (Mengeš) 之子，實應與同在清廷服務而著稱於世的耶穌會士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懷仁和戴進賢等並列汗

青。今日，實應自史料中認識其思

想，重建其歷史活動，並重估其歷史重要性。<sup>10</sup>

作者為斯洛文尼亞盧布雅納大學亞非研究學系教授  
譯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註釋

1. 卡爾尼奧拉地區是奧地利擁有斯洛文尼亞人口的一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新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的一部分，這個國家後來成為了南斯拉夫。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瓦解，斯洛文尼亞共和國遂得以獨立。
2. 鞠德源一九八五。又參見Sajce ed., 2009, pp. 161-205。
3. 例如他在二七四七年和二七五三年致英國皇家學會的兩封書信和他的天文觀測紀錄，都被英國皇家學會的公報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所出版。而聖彼得堡科學院則在公報 *Novi commentarii* 上出版他的天文紀錄。(Maver 2009, p. 212)
4. 中譯此書的計畫由中國科技大學考古系執行，已經接近完成，預定於二〇一五年上半年出版。
5. 他在葡萄牙停留一年多，學習葡萄牙語和天文學。在里斯本，他結識了葡萄牙女王王太后，在稍後待在中國的歲月中，他持續與王太后女王書信往來。
6. 關於他航向中國的歷程，可以參見Šmitek 2009, pp. 65-75; Južnič 2012, pp. 321-329。
7. 關於歐洲進一步出版他的著作在歐洲流傳的歷史源流，可參Šmitek 2009, pp. 56-58。
8. 此處所發現的彗星，可能是由歐洲天文學家梅瑟於一七六九年八月八日所發現的拿破崙彗星。感謝周維強博士提供此一發現。
9. 譯注：此處所指孟子所言，應係採自孟子與梁襄王的對話。原文為：「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 參考書目

1. Južnič, S. (2009) 'Vacuum and Electricity for the Chinese Emperor'. In: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edited by Miha Sajce, pp. 209-235.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Ljubljana: Arhiv Republike Slovenije.
2. Južnič, S. (2012)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Observatories of Petersburg and Beijing: A Study on the Jesuit Avguštin Hallerstein from Present-day Slovenia. Celebrating the 31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Monumenta Serica*, no. 60, pp. 309-406.
3. Maver, A. (2009) 'A Word on Hallerstein's Letters'. In: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edited by Miha Sajce, pp. 209-235.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Ljubljana: Arhiv Republike Slovenije.
4. Sajce, M. (ed.) (2009)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Ljubljana: Arhiv Republike Slovenije.
5. Sajce, M. (2009) 'Rediscovering Augustin

1. Hallerstein and his Work in Beijing'. In: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edited by Miha Sajce, pp. 209-235.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Ljubljana: Arhiv Republike Slovenije.
2. Šmitek, Z. (2009) 'The Last Great Astronomer in the Chinese Court: Avguštin Hallerstein'. In: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edited by Miha Sajce, pp. 51-115.
3. Ju Deyuan 鞠德源 (2009) "Liu Songling, Head of the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A. Hallerstein - Liu Songling: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 edited by Miha Sajce, pp. 161-205. Maribor: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Kibla: Ljubljana: Arhiv Republike Slovenije.
4. 鞠德源 (一九八五) - 《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 - 《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頁五三—六二。
5. 高晉瑜、馬愛德主編，《離逝猶存：冊欄：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地》，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舊金山：舊金山大學利瑪竇研究所，二〇〇一。